

哲人时代的诗意英雄

——读《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

■冯立

先秦古籍之中成书最早的是《诗经》，其收录诗歌跨度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至春秋中叶，《诗经》依据题材不同，分为周人歌谣的“风”、周人正声雅乐的“雅”与周人祭祀颂歌的“颂”三部分。《诗经》是最能体现两周时代社会风尚的标志性文化作品。

孔子是《诗经》文献的编撰者，春秋以来《诗经》中“风”与“雅”的题材发生变化，即“变风”与“变雅”。在此之后孔子将《黍离》一篇不列于“雅”诗之列，而列于“风”诗之中，在孟子看来是“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而此后朱熹认为孔子这一转变是诗歌消亡的转变。朱宝昌先生认为朱熹、孟子与孔子判定诗歌性质的立场均是建立在政治层面的，而非单纯文学性层面对诗歌的考量。孟子指出“诗亡而后《春秋》作”。见证了春秋及其以前诗人时代的结束，战国以后迎来了哲人时代。

哲人时代中的历史人物，其个体地位与前途决定于他们的才能与学术，而非决定于其家世。此一时代社会上有一类特立独行的新型人物，他们以打击豪强、扶植善良为己任，以重交尚义、一诺千金为信条，其身上充满了诗意的浪漫主义豪情色彩。这便是司马迁所歌颂的“国土之风”，而司马迁本人也是这样的历史人物。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其著作《历史中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变性人物，一类是事变创造性人物，历史中的英雄属于后者，即他们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种种卓

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英雄的伟大不仅是要凭他的所作所为如何，而且要凭他这个人本身如何。他们不但能在历史路线上创造交叉点，还善于发挥其特异的领袖天才能力，他们个性积极的烙印刻在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

陕西师范大学已故朱宝昌教授，在其遗著《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首篇论文《先秦文学、政治、人物、学术思想、社会风尚总论略》中指出，春秋时代社会礼制也在不断崩坏，在《诗经》中出现变风与变雅的风格变换，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精神状态、物质生活与人际关系层面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转变。此后他又分10篇论文论述自春秋战国至嬴秦两汉的千年历史中，除秦皇汉武以外，还有孔子、庄子、屈原、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司马迁、诸葛亮和曹操可称为战国秦汉千年之间“哲人时代的诗意英雄”，他们都是政治的参与者，孔子和庄子是政治思想家，其他几位都是著名的政治家，而能成就他们历史烙印的共通特征在于他们同为时代的诗人的浪漫豪情特质，其政治出发点在于民是主题，对民有利才是对君有利之事。



《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
朱宝昌著
商务印书馆

在中国上古时代，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属性并不是鲜明唯一的，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每一个人从其出身背景到治国修业的人生经历均是兼容并包的。朱宝昌先生在《孔子——从作〈春秋〉说起》一文中指出，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的宋国贵族背景出身，但是他在鲁国著书立说开门迎徒，奠定了其一代圣人的历史功绩。其门下弟子均得益于《诗》《书》《礼》《乐》之教化，或从事商业活动，或投身政治活动，其弟子遍及

天下各国。可谓开春秋时代事变创造性人物。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分为八支，可见孔子的历史壮举影响多么深远，其招徒讲学的模式到战国时期得以推广，才成就了战国诸子百家的文化兴盛。

战国时代，继承老子学说的庄子也为道家学说开宗立派。庄子也是宋国后裔，但他南下入楚求学成才。朱宝昌先生通过疏解庄子名篇《齐物论》指出，虽然关于此篇文献的研究多在哲学层面的探讨，但是其文章的艺术性与美学价值，完全可以媲美屈原的《离骚》，庄子虽然在阐述哲理，但其阐述方式是浪漫而又富有诗意的，此一手法善于抓住民心，继而著书立说。

谈及庄子与《离骚》之后，朱宝昌也着重分析了屈原的人生取向。历史的固有印象是屈原是楚国贵族，而老庄之说盛行于楚。但我们不能忽略屈原的时代性，屈原所处的楚怀王时代，楚怀王的历史功绩之一便是吞并了越国。而在之前孔子弟子的学术传承过程中，其后期代表弟子子游，将其学说传到了吴地。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楚地有着完整的《易》学传承系统，与屈原同时代，但比之年轻一些的荀子，后到楚国东部的兰

陵当官，并教授儒学。故而可以判定屈原也是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作者在《论〈离骚〉三次求女及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中指出，屈原“忠君爱国”的生命志向，深受孟子影响。孟子思想的特色是民本主义，而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政治诉求是以民为本的，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其诗人属性与诗歌的文学高度在历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秦汉之际，从秦代汉初法家的严刑峻法体制过渡到文景之治时代的黄老无为思想转变，一直是秦汉思想史的重要课题，朱宝昌先生在《论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兼论道家、儒家和法家》一文中提出了“用法家”这一特有概念，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书写《老庄申韩列传》，将道家与法家的代表思想家合为一体，是因为法家大为特为的思想，始于道家的清静无为，兼及儒家孔子的仁、孟子的仁义、荀子的礼乐相结合之后产生。两者是最终实践与最初源发的关系并不矛盾。

朱宝昌先生早年求学于东吴大学国文系与燕京大学哲学系，受教于闻一多与熊十力先生，其作品文史哲互通，国学底蕴深厚别具风采。作者本人早于1989年仙逝，故而《先秦学术风貌与秦汉政治》一书所收文章最近的已逾30载，这些年来先秦两汉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向出土文献研究，这种纯粹立于文献文本的分析考证，今日再现仍能给学术以启迪，其历史功绩可为一家之说。

肉眼紧闭了，但灵魂却开眼了

——从《漫游者》漫谈文学中的死亡意象

■蟠龙海

濒死的体验以及死后的世界无从传递和保留，描摹起来也颇具难度，但死后之事和后人的感受终是可以被记载的，因此，悲悼惋惜亡者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朱天心就是通过《漫游者》的文学想象，重建与亡父中断了的生命关联和情感交流，如书名所示，悲恸和思念呈现无边无涯之势，漫漶于四野八荒。能把死之恐惧加以美化，写得如此散逸，必对人生抱持着深邃的观望和透彻的觉悟。

很明显，朱天心受到了爱伦·坡等前人的启示，但她笔下的死亡，并不苍凉，反而生就出一丝丝人间烟火气。死神的踪迹也烟消云散，这便是得益于朱天心偏偏把死亡暗合在阳间的世界里去写，造成了“人鬼并不殊途”的意境。追悼亡父，反而使朱天心保持着对生命的省察与觉悟，拓展出对自我疆域的认识，从而最终完成对死亡的超越，这便营造出另一番“死，而不亡”的希望所在。这让人不禁想起台湾电影《父后七日》中的两幅场景：小时候，父亲用单车载女儿回家；父亲的葬礼结束，两者对调位置，女儿把父亲的遗像挂在后座，那一幕，仿佛恰好例证着朱天心笔下的“漫游”二字——血缘生命体的对接、代际情感的追溯、无垠时光的奔逝……无不可以解释张爱玲何以在《对照记》里指着祖父母的老照片幽幽地说：“等我死的时候，他们会再死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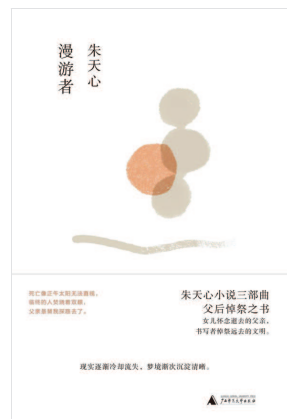
文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意

识的总体性的审美呈现，死亡，只不过是肯定的形式去确证生的价值，死亡彰显的生命有限性，恰恰可以促进每个人探寻、规划和省察自身活着的意义——死亡虽是短暂肉体的终结，但往往又意味着精神的升华，直至永恒。死亡意识、死亡叙事皆对推动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等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影响，故而说文学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文学，两者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绝非危言耸听。

恰是因为与死亡的勾结与媾和，使得古今中外许多文艺作品读来格外荡气回肠、动人心魄：黛玉之死、安娜之死、维特之死是所在作品中最打动读者、最令人深思、也最具美学价值的经典桥段。村上春树、川端康成、渡边淳一等日本作家群体常借樱花、白雪意象之瞬美、易逝，创造出独特的“物哀美”……笔墨间，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和幽玄的虚无感。传奇般的经历和独特复杂的遭遇，强化了海明威对生命的理解，人生后期的沉疴重病，更造就了他对死亡情结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时不时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着，但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是平静的，所释放出来的那种大无畏以及从容，分明展现出海明威对死亡的理解和尊重——能以坦然心态，理智地接受死亡，并领悟其真谛，这是一种蔑视死亡、无畏死亡的硬汉精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展现了各种形态的“孤独”和形形色色的“死亡”，两者紧密相连——孤独必然导致死亡，孤独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爱伦·坡将死亡意识糅进诗歌中，对生命加以形而上的沉思，在书写中将死亡意识与生命沉思融化成一种审美特质，并通过诗句将死亡的场景寓言化，通过散文诗《沉默——一个传奇》和诗歌《海中之城》《不安的山谷》这些文本，印证了语言与死亡之间那天然不可割舍的联系。

通常来看，文学家们通过文字不外乎表达对于死亡的三种态度：第一，肯定死亡；第二，否定死亡；第三，超越死亡。《漫游者》通过瑰丽而饱满的想象力，带着父亲的亡魂重游、复刻他的人生路，借此来启示我们生命形式是不朽的，所谓的“死亡”仿佛也只是暂时的，它最终将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与茫茫天地同行。生既是死，死就是生，朱父的“死”与朱天心的“生”之间形成默契十足的回环：“不以生生死，不以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体。”（庄子《南华经》）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人是必死的存在，不妨说得再诗意点，人终归是向死而生的。或哀戚，或悲壮，总之，死亡成就了文学的核心审美和情趣。死亡之于文学家，正如蛋炒饭之于厨师，考验的都是筒中见繁的真功夫。亡父之死，成就了朱天心，既



《漫游者》
朱天心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让她跨越年代的鸿沟，对上代人陡增几许了解与敬意，更对生活之况味多有觉知和感怀，从《漫游者》可观之：向死而思，类似于向死而生，贯穿了生与死之间的通途，特别是朱天心把死亡当起点来写，以“死”写“生”，把生的美好当作目标，展现的都是高级的笔意和笔法，无论如何铺陈死亡场景，抑或建构死亡意象，朱天心笔下的文字终极的眷注是征服死亡的凛冽，反其道地歌颂生的快意。换言之，无论死亡何等荒凉、凄厉和恐怖，她都着力激励人们追寻一种生命的真实，死亡造成的天人相隔、生死殊途等悲苦和创伤被她换就了一番团圆、再生姿态。于是，书写，在它远离时间、空间和肉体世界之时，反而体现了生命的大美——死即生，死即美，死亡赋予了写作者以天眼，看到了横亘于幽明两界间的种种可能的图像。

文学终究让死亡显影，而死亡，反过来，让文学愈发深刻。若读懂了黛玉临死时的种种表现，便可深刻地体悟出林妹妹的爱恨情仇，同理，读懂了《漫游者》里的呼唤和嗥喘，便可知：凡胎陨灭了，肉眼紧闭了，但灵魂的眼睛却睁开了。